



DAXUE MINGSHI JIANGKE SHILU
大学名师讲课实录

魏晋文人 讲演录

马良怀 著

- 第一讲 文人与士人的联系与区别
- 第二讲 庄子与中国古代文人的出现
- 第三讲 中国文学之根——屈原、宋玉
- 第四讲 由宫廷侍从到独立生存——两汉文人（一）
- 第五讲 由宫廷侍从到独立生存——两汉文人（二）
- 第六讲 曹操、孔融及建安风骨
- 第七讲 郡下群体与文人阶层的产生——郡下文人（一）
- 第八讲 全新的生活方式——郡下文人（二）
- 第九讲 拂晓星的光彩——竹林文人（一）
- 第十讲 红尘中的超脱——竹林文人（二）
- 第十一讲 抱朴守拙之文——竹林文人（三）
- 第十二讲 器具人格缺陷的群体——西晋文人（一）
- 第十三讲 张华、石崇及贵族——西晋文人（二）
- 第十四讲 审美与诗学——东晋文人（一）
- 第十五讲 审美与诗学——东晋文人（二）
- 第十六讲 魏晋文人与艺术

附录

一、治学感言：走向学术殿堂的三阶段

二、主要论著简介

三、主要论文目录

跋



大学名师讲课实录

马良怀 著



魏晋文人讲演录

WEIJIN WENREN JIANGYANL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晋文人讲演录 / 马良怀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3

(大学名师讲课实录)

ISBN 978-7-5633-8302-3

I. 魏… II. 马… III. 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549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明秀西路 53 号 邮政编码: 530001)

开本: 720 mm × 960 mm 1/16

印张: 13.75 插页: 1 字数: 260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8 000 册 定价: 28.00 元 (附光盘)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讲	文人与士人的联系与区别	1
第二讲	庄子与中国古代文人的出现	13
第三讲	中国文学之祖——屈原、宋玉	29
第四讲	由宫廷侍从到独立生存——两汉文人（一）	40
第五讲	由宫廷侍从到独立生存——两汉文人（二）	54
第六讲	曹操、孔融及建安风骨	65
第七讲	邨下群体与文人阶层的产生——邨下文人（一）	77
第八讲	全新的生活方式——邨下文人（二）	97
第九讲	黑暗里的光亮——竹林文人（一）	107
第十讲	红尘中的超越——竹林文人（二）	120
第十一讲	艳逸壮丽之文——竹林文人（三）	133
第十二讲	最具人格缺陷的群体——西晋文人（一）	145
第十三讲	张华、石崇及张翰——西晋文人（二）	157

第十四讲 审美与诗意——东晋文人（一）

167

第十五讲 审美与诗意——东晋文人（二）

180

第十六讲 魏晋文人与艺术

191

附 录

209

- 一、治学感言：走向学术殿堂的三阶段 209
- 二、主要论著简介 212
- 三、主要论文目录 214

跋

216

第一讲

文人与士人的联系与区别

我们这个课的名称叫“魏晋文人研究”，是讲一个阶层、一个群体的。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文人是从士人之中走出来的，因此一般而言，学术界将它和士人混在一起，没有加以严格的区别。所以，当我们讲文人的时候，首先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即文人与士人的联系与区别。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中国士人阶层的出现、发展及其特征。

中国士人出现于什么年代？现在学术界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关于远古时代的资料，我们今天掌握得很少。现在大部分学人都是从文字学的角度对士人进行考察，认为“士”和“事”是一个字，就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男子。这个可能是最原始的含义，与我们今天讲的士人没有多大的关系，而作为文化人的士人，具体形成于哪个年代，现在学术界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不过，有一点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那就是：在殷商西周时代，士是属于贵族的一部分，是比较低级的贵族。这个贵族层级的上面，还有君、卿、大夫等等。那么，在西周之先，就是在分封制下，士人是贵族阶层中的一部分。那个时期的士人有比较严格的限制。以社会身份而言，限定于贵族阶级之内；在政治方面，它限定在各种具体的职责中间，担任着具体的职务；从思想上来讲，它限定于诗、书、礼、乐等官学的范围。我们知道，在孔老夫子之先，学是属于贵族的特权，到孔老夫子的“有教无类”，教育权才下移到平民百姓；教育的内容就是诗、书、礼、乐这些官学的传授。那么就是说，在殷商

西周时期，士是作为一个阶层而存在的。那个时候的士诚如曾子（孔老夫子的弟子）所说：“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这是西周之先士人的存在状况，可以说是中国士大夫这个阶层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士人是贵族阶层的一部分，是低级贵族。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从政治上讲，就是原来的分封制和周天子统治的具有相对意义的一统局面被破坏，进入了诸侯割据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一方面，是分封制遭到了破坏，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大变动。阶层的大变动中，一方面是贵族的衰落和下移。贵族这个阶层衰落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贵族就沦落为非贵族，就是庶民阶层。另一方面，是庶民的上行、提升。由于社会变动，原来一部分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向上，社会地位提高了。士、庶在这个上升和下降的过程中开始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到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的队伍逐渐地壮大起来了。春秋战国时期应该说是中国的士人阶层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是士人由原来的低级贵族沦为四民之首，另一方面是士人的队伍获得了空前的壮大，并在历史的舞台上发挥出前所未有的作用。

所谓四民，指的是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沦为四民之首，就是由原来的低级贵族沦落为庶民，人数也在这一时期增加了。沦为四民之首后，士这个阶层就有了身份上的、思想上的自由。也就是说，从原来的贵族阶层中被抛出来之后，一方面表明他们社会地位下降了。但同时呢，他们又不隶属于某一个阶层了，带来了身份上、思想上的自由，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些人就成了“无定主”的游士。春秋战国时期是士人阶层形成过程中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地方割据势力、诸侯势力兴盛，出现了所谓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有实力的诸侯王们都想称霸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由原来的低级贵族沦落为四民之首的士人，便可以凭借着身份上的自由和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诸侯国之间穿梭行走、游说人主，求得一官半职，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一方面是周游列国，干进求禄；另一方面又从具体的阶级和封建关系中间游离出来了，具有超越性。他们超出了个体与某一个群体之间的限定，而把对整个社会的关切，作为自己的一个追求。这一时期的士成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原型。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把道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用孔老夫子的话说，叫作“士志于道”。孔老夫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并且说士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就是把道作为他们的终极追求。那么什么叫“志于道”？曾子曾经有过一个比较具体的解释。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是他对道的具体解释。而后来的孟子在孔老夫子的基础上有了更详细的解释，他说：“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

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都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具有一种超越于某一个特定的阶层群体之上的超越性，把道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同时呢，这一时期的士，又具有积极入仕、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对整个社会予以深切关怀的精神。

这一时期的士持着一种“道”与“势”相抗的观念。他们和王侯之间保持的是一种师友关系，而不是君臣关系。也就是说，士人不是作为某一个阶层的代表，它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正义、良心。所以，在这一点上说，它具有我们今天说的“知识分子的特性”。关于这一问题，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有专门的论述，可以参考。春秋战国时期是士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士的一些基本特征，在这一时期显现出来了。

士人在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阶段，是西汉的武帝时期。我们知道，西汉武帝时期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整个大一统的专制政权的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为了适应大一统专制政权的需要，把诸子百家中儒家以外其他各家思想，如阴阳、墨、名、法、道、纵横等，全部给打压下去，只推崇一家——儒家。儒家思想是统治阶级唯一推崇和允许人们学习、接受的思想。这是思想上的大一统，它和政治上的大一统是相适应的。确立儒家思想在大一统专制社会里面的权威性，这是一个变化。

与此相关的，就是察举征辟制度的确立。这是大一统专制社会建立的一个比较完整的选拔人才的制度。那么察举征辟制度的依据是什么呢？它的依据就是对儒家学说的学习和实践。学习的内容是《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的几部重要经典，并为此设立了所谓的五经博士，把它作为官方学术来推崇、推广，让人们去学习。通过对儒家经学的学习，进而对儒家的思想规范予以实践，修得一个好的名声。这个“好”的标准就是：是不是儒家学说的忠实实践者，而实践的重点是“孝”。然后，由地方官吏定期向国家推举，由朝廷进行考察，最后进入庙堂之上参与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察举制。征辟制度和察举制度基本内容是一致的，都是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忠实实践儒家学说；不同的是由皇帝根据具体情况不定期地要求地方官吏向国家推举人才。

这里最主要的就是，儒家学说成了士人学习和实践的主要内容。这一点在士人的发展阶段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说，士人除了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具有对社会的关切这一特性之外，又加上了对于大一统政权的依赖，“士”和“仕”联系在了一起。这一时期士人的主要任务、主要目标是通过学习儒家，对儒家思想规范的实践，进入朝廷，实现人生价值。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士的发展过程中另一个重要时期。

从武帝确立察举征辟制度，儒家经典成为士人学习的唯一内容之后，士在这一时期就不再是春秋战国时期那种“无根的游士”了。前面讲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不是属于某一个阶层的，它也不是某一个群体利益的代表。但是到了西汉中叶，在大一统专制政权之下，士人成为这个政权的依附者。士和“仕”，也就是和官僚政治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士和官僚中间画上了等号。

西汉之时的士人已不是“无根的游士”的另一个表现是，他们和家族的利益连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肩上，已经扛起了家庭兴衰的责任。

察举征辟制度实行之后，大一统的专制政权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士人不可能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在诸侯国之间穿梭游说，具有自由度。大一统实现之后，天下归于郡县，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确立了，穿梭游说的前提条件不存在了。在这一变化中，出现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人物，这就是贾谊。贾谊有一篇著名的赋，叫作《吊屈原赋》。在《吊屈原赋》里，他拿自己发感慨。他认为屈原当年那么好的条件，却把自己的一生都绑在楚国的利益上，真是很遗憾。因为在贾谊看来，在那个时代，你大可不必这样做。“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在楚国不被重用，可以到齐国、鲁国、秦国去嘛，像苏秦、张仪那样。所以他在《吊屈原赋》中对屈原的这一举止表示了他的遗憾。司马迁在《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后面，也曾经对这个问题表达过自己的看法。贾谊虽说是武帝之前的人物，生活于文帝时期，但当时大一统的专制政权已经建立，士人失去了那种自由地穿梭于诸侯之间的条件，没有选择性了，必须依附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权之下。这一依附，使得原来的那种自由、那种超越性丧失了。这是进入大一统专制政权之后的一个变化。士人之所以同家族联系在一起，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汉武帝推行察举征辟制度之后，各个家族开始重视对本家族人才的培养。因为它有具体的内容，就是学习儒家经典的内容，然后实践，然后造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社会上为本家族优秀的人才作宣传，为他们制造出一个好的名声，然后把他推举到朝廷中去。而这些人一旦进入朝廷当了官，他的身上也就扛着整个家族兴衰的重任。因此，这一时期的士人再也不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自由了，他肩上的担子变得沉重起来了。这就是士人和家族的发展、家族的兴衰联系在了一起。

西汉之时士人的发展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大一统的专制政权发生了密切联系，另一方面是与家族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与大一统的专制政权联系在一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士人没有选择性，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还可以选择。我为什么拿贾谊来做例子呢？因为贾谊之先，就是在秦灭亡和西汉初年这一时期，那样一个战争年代，像张良、陈平这些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一些选择

性。你项羽不重用我，我可以跑到刘邦那里去。但是到了文景之后，这一选择基本上就不可能了。当然，文景之时相对于武帝时期而言，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为什么呢？因为那一时期是郡国并行的制度，就是那些刘姓的诸侯国的王手中还有一定的权力，甚至可以说还有很大的权力。我们知道，刘邦打下天下之后，把异姓王全部给灭掉了，只留了长沙王吴芮一个微不足道的异姓王，而其他的人，像韩信、彭越、黥布等，全被灭掉了，然后大封同姓诸侯。这些诸侯王在武帝之先具有很大的权力，如用人权、财权等，甚至可以铸造货币。如果有一些士人觉得在楚王这边不行，他还可以到吴地去。像当时的淮南王，手下就养了大批的士人、食客、门生。吴楚“七国之乱”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诸侯王权力开始削弱。尤其到了武帝时期，实行推恩令，把诸侯国无限地划分、缩小，使它没有实力与中央对抗，还剥夺了他们的财权。这样一来，士人唯一依赖的对象就是中央专制政权。并且在思想上，他们这一时期也只能接受一种思想，就是儒家思想。我们知道，儒家思想的特征，就是注重社会秩序。我们把孔、孟、荀的著作翻开，可以归纳出这样几点：一是重社会秩序；二是重外在规范，就是礼法；三是重群体利益，就是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四是重人格、重气节。这些都是士人在学习儒家学说、实践儒家规范中必须遵循的准则，因此，也就成了士人的特征。

西汉以下，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推行察举征辟制度之后，士人阶层在和大一统的专制政权、和家族紧密联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在政治上充分发挥出自己作用的群体。这个群体可以说是从武帝之后逐渐在政坛上扩大影响的。到了东汉时期，这一个阶层在政治上的作用、他们相互之间的那种密切联系、他们在利益上的一致性逐渐显现出来了。比较典型的，就是东汉的党人。东汉党人在东汉政治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在东汉王朝衰亡的过程中，正是有赖于这样一群人的存在和他们的努力，才使得东汉王朝延缓了它的衰落。关于这一点，南朝的范曄在《后汉书》的《党锢列传》里面指出：“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所谓“数公”，指的是哪些人呢？就是指李膺、陈蕃、范滂这些人，他们是东汉党人的领袖。东汉党人可以说是士人中间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群体。中国士人的许多特征，在这一群人身上充分地显现了出来。可以说，自西汉中叶以降，士人也就成了所谓的士大夫了。士和仕，也就是和官僚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把春秋战国和西汉中叶之后士人的特征综合起来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士人阶层把道德追求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具有一种积极入世、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对整个社会予以深切关怀的精神；同时他们又是注重社会秩序、注重外在规范、注重群体利益、注重人格气节、注重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实践的一群人。这些都是士人的基本特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的“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应该还是比较适合的。

第二个问题，文人的出现和它的基本特征。

我们翻开中国文学史，就会发现，中国早期著名的文人，比如说庄子、屈原、宋玉、司马相如等，都出现在长江流域。这不是偶然的。可以这样说，中国文人的摇篮是在长江流域，在楚文化的范围内。中国的文人的产生，如果从时间的划段上讲，应该是战国时期。虽然我们今天的文学史也介绍孔子、孟子、荀子这些人，实际上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和我们今天讲的文人不是一回事。他们是属于士人那个群体的，不是文人。文人和士人有联系，因为他们同属于知识阶层；但是文人不是去讲安邦治国的那些大道理，不是讲经世致用这些东西，而主要是言志抒情这一类，抒发自己的情感。具体而言，中国的文人是从庄子、屈原、宋玉这些人开始的。

为什么长江流域会成为中国文人的摇篮？我以为这与它的地理环境是大有关系的。我们知道，长江穿行于南方的青山秀水之中。那些地方山高水阔，湖泊纵横，云雾缭绕，弥漫着一种神秘、幽深的气息。所以长江的水所孕育出来的是一种与黄河流域风格迥异的文化。这种文化柔弱似水，空灵飘逸，风情万种，充满着浪漫的想象、奇特的思维、飞扬的激情，充满着对天地万物强烈的好奇与同情，执著于追问和探索。

有一位叫张正明的学者，在他的专著《楚文化史》中有这样的描述：“南方既是山川相缪之区，又是夷夏交接之域，在楚国强盛起来以后，从典章制度到风土人情，无不参差斑驳。蒙昧与文明，自由与专制，乃至神与人，都奇妙地组合在一起，社会色彩比北方丰富，生活节奏比北方欢快，思想作风比北方开放，加上天造地设的山川逶迤之态和风物灵秀之气，就形成了活泼奔放的风格，而活泼奔放的极点便是怪诞以至虚无。”这是张正明对楚文化即长江流域文化的揭示。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得更加清楚：“楚国之壤，北有江汉，南有潇湘，地为泽国，故老子之学起于其间，其从学者大抵遗弃尘世，渺视宇宙，以自然为主，以谦逊为宗。”他还把南方的文与北方的文作了一个比较，认为南方的文风与北方的文风大不一样。他说：“南方之文又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即由于北方的地理环境而致使那里的老百姓多尚实际。而“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这是南和北的不一样。“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由于北方的老百姓多尚实际，所以反映在文这一方面，他们主要的一是记事，二是析理，在理性的层面上思考和写作。而南方呢，“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一个是写出自己的志向、自己的感受，第二就是抒情。可见文人之所以出现于长江流域，与这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有着绝大的关

系。王国维曾经在评屈原的文章《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这样说过：“南人想象力伟大丰富，胜于北方人远甚。”即在想象力方面，南方人大大超过了北方人，“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大言则有北溟之鱼”，就是说大的话，就有北溟之鱼。《逍遥游》中那条鱼有多大，我们都清楚都知道。“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就是说小的话，有蜗牛触角上面的小国家。“语久则大椿冥灵”，讲时间的久远有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这种想象力确实很丰富！这些都是《庄子》里面的，读过《庄子》的人都清楚。“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这就是指南方的地理环境，由此而出现的文化和我们讲的文人的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长江流域这个地区的文化孕育、催生了一群早期的文人，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庄子、屈原、宋玉、司马相如等。这些人都是南方的，都是长江文化的代表人物。翻一翻中国的文学史，中国早期的那些数得着的著名文人，一个个都产生于南方，而在北方，我们就很难找得出这样的代表人物。

从思想文化上讲，在中国历史上，在佛教没传进来之前影响最大的是两种思想：一个是儒家，一个是道家。儒家思想产生在北方，在黄河流域。那个地方的文化就是刘师培说的“多尚实际”。所以儒家重社会现实，重规范重群体。另一个影响最大的，就是道家。道家思想产生于长江流域，其中主要是以楚文化为代表，这与这里的地理环境有关系。道家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多尚虚无，浪漫、超越、空灵，还有不断追问的精神。我们看，屈原在《天问》中一口气问了170多个问题。在那里面，他问天、问地、问神、问人、问自然、问社会、问宇宙之始、问人类之初，可以说把天地六合都问了个遍。这就是楚地文化产生的一种追问精神。中国的文人就诞生在长江流域。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来讲，就是每一个群体，或者一个民族，它产生之初的机因构成对于它后来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同样，文人阶层由于它的产生地在南方，在长江流域的文明之中，所以道家的文化、道家的思想在这一阶层身上便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当文人从士人群体中走出来之后，便显现出和士人阶层的巨大差异。虽然二者都属于知识阶层，虽然文人身上也明显地打着士人的某些烙印，但是，作为一个新的群体，文人与士人之间又有大的区别。

第一，文人重视的是个体生命。我们从最早的文人——庄子身上看起来。关于庄子我曾经在很多地方谈到过，实际上也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庄子是最早反社会异化的人，也就是，他追求的是个体生命的真谛。我们从庄子的著作中能够找到大量的这样的论述。第二是重性情，也就是注重自己的主体感受。第三是注重理想人格和精神意境的塑造、开拓。第四是注重文学艺术的全面发展。文人是以人生的真实、自由为追逐目标的，这些人在思想上与道家关系密切。这

是文人阶层的特征。如果我们要用诗句来概括文人的特征的话,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比较合适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同重社会秩序、重外在规范、重群体利益、重人格气节、重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实践、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在思想上与儒家思想关系密切的士人阶层相比较,文人与士人是有重大区别的。

但是,文人和士人又都属于中国的知识阶层,他们所接收的文明和文化的根源都是一致的,因此,二者又具有难以完全分割的关系。同时,正因为文人是从士人中间走出来的,士人的有些东西也就必然地要长久地影响文人。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很多文人的身上,既有明显的文人特征,但同时也会显现出土人的某些特性,不能够截然分开。这就是文人和士人的关系:既有重大之区别,但也有无法完全割断的联系。

第三个问题是文人阶层的出现和发展。

从文人的发展来讲,它的出现是在战国时期,以庄子、屈原、宋玉为代表。到了两汉时期,像司马相如、东方朔、扬雄这些人,应该说他们都属于文人。但是这一时期,也就是说在魏晋之前,很难说文人是一个阶层。文人作为一个阶层的出现,是在汉魏之际,就是东汉末年到曹魏之间。翻阅一下《全后汉文》和《全三国文》,会发现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和以前不一样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文人,他们的文学创作,打破了那种散体大赋的格式,摆脱了讽谏规劝的模式,他们更多的是在写自己的心灵感受,写身边的风花雪月。把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一些感悟用文学的笔写出来,张衡是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从文学史上看他是从散体大赋向抒情小赋转折的一个关键人物。张衡以下到东汉末期,我们把《全后汉文》翻出来,就会发现那些文人在写什么。写一阵凉风、一把蒲扇、一支长笛、一把古琴,写日常生活中间的那些感悟,所见所闻,以及他们心灵的感受。他们以抒情的笔调写出来,或者用言志的方式写出来。所以在这一时期,我们会发现《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又新设了一传,叫作《文苑传》。《文苑传》里面就是写有别于读儒家经典的士人学者的不同类型的一群人。我们在《世说新语》中可以见到更多的这样的名称,像《名士传》、《文士传》、《文章志》等,这都是写文人阶层的。可以说,文人阶层作为一个阶层出现,从士人中间走出来,形成自己的风格,是从汉魏之际开始的。具体地说,如果要以哪一个东西做标记的话,我个人认为,应该以曹魏的邺下集团的形成为标记。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文学史上的“建安七子”。他们里面除了孔融没有到邺下以外,其他都在邺下活动。邺下集团是以“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他们父子为领袖,集中了王粲、阮瑀、刘桢、陈琳这些人,其中还包括像“建安七子”之外的吴质、杨修、路粹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出现可以说是文人阶

层正式形成的标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以后几讲中会具体分析，这里先勾勒一下。

汉魏之际文人阶层的出现与当时社会的政治和文化上的转折、变革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们知道，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专制政权，后来的汉武帝为这个专制政权寻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就是天人感应神学。从此之后，以天人感应神学为基本内容的思想占据着思想界的霸主地位，而在政治上则是大一统的中央专制政权。

时至汉末，社会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其一，公元 184 年爆发了著名的黄巾大起义，起义虽然最后被统治者镇压了下去，但自此以后，东汉王朝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历史又进入一个军阀割据的战乱年代，大一统的中央专制集权局面被破坏了。

其二，天人感应神学到东汉后期开始衰落直至崩溃，由此带来了思想上的自由，人们再不需要在那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的局面下生存。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思想的“梅开二度”，像儒、道、名、法、兵这些思想纷纷走上了复兴之路，思想上的自由度更大了。

其三，出现于两汉之际的大土地占有制于东汉逐渐地演变成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即庄园经济，到东汉后期又有了大的发展。庄园经济的特性有二：一是绝对的私有性，二是充分的自给自足。充分的自给自足使得庄园的主人逐渐淡化了对朝廷的依赖，同时也为后来文人潜心于艺术和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此外，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汉魏之际正好处于第二次飞跃时期。

人类发展的第一个飞跃是人把自己作为一个独特的类从万物中间独立出来，意识到自己是最高级的类，高出于其他类的类，即所谓的人与禽兽之别。这一飞跃在我国发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而到了汉魏之际是人的发展的第二个飞跃时期，就是个体把自己从群体中间独立出来，意识到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都是纯个体的事，个人的存在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存在。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人的觉醒。这个觉醒实际上从东汉末期就开始了，比较典型的像《古诗十九首》，像《列子》的篇章中都有大量反映人的觉醒的内容。

汉魏之际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为文人阶层的产生、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回想一下我在前面归纳出的文人的特征，即重个体、重主体情感、重理想的人格塑造和开拓等，这恰好是变革时期带来的文人阶层的发展。

时至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的黄金时代。虽然那是一个战乱年代，但对于文人来说，那一时期是他们生活的黄金时代。在那一时代里，因为思想文化的专制局面被打破了，人们在思想上有着充分的自由。同时这一时期又是道家思想盛行的年代。我前面讲过，文人是和道家思想关系密切的。道家思想的形成为

文人阶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途径。另外,由于庄园制的出现,庄园经济为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文人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所以这一时期文人阶层的基本特征,譬如标志着文人身份的琴、棋、书、画等这些文人应该具备的技能都在他们身上出现了。

这一时期出现了像王羲之、顾恺之等很大一批为艺术而艺术,把艺术视为生命的人。这一时期的文人我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一群人,他们充分地凸现出自己的个性,用《世说新语》的话来说,是千载之下“懔懔恒如有生气”的一群人,个人魅力非常明显。我认为这一时期的那些文人,具有一种贵族的气质。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史上纯粹的文人,我认为只存在于魏晋时期。

到了隋唐时期,在选举制度方面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这就是科举制的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九品中正制,而九品中正制是和所谓的门阀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它一开始并不和门第联系在一起,而是出于唯才是举这样一种目的,但是到了司马氏掌权之后,逐渐地出现了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这样一种门第观念,就形成了一种贵族的气质,讲家世门风。关于这个问题,探讨的人很多,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到了魏晋时期,由于庄园经济的发展作保障和九品中正制这样一个保护门第的选官制度的存在为文人的生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超越世俗,在精神的领地里逍遥遨游,创造出一批纯艺术的东西来。但是到了隋唐之后,由于科举制的出现,发生了变化。学术界曾有人归纳说,科举制的出现是“平民化政治”的开端,因为九品中正制是讲门第的。我为什么说那个时期的文人具有一种贵族的气质呢?曾经有一个外国学者这样说过,要制造出一个暴发户,一夜时间就够(有一个电影叫作《百万英镑》,给他一张百万元的支票,他马上就成了暴发户)。但是,要制造出一个贵族出来,至少要经过三代以上血缘上的努力。这主要是从文化气质上讲。但是到了实行科举制之后,无论任何人,只要你通过科举考试,你都可以到朝廷做官。这就和出身没关系了,哪怕你是一个杀猪的也行。我们看《儒林外史》里面那个中举的范进,他的岳父就是一个屠夫。由此可见,实行科举制之后,由于选举制度的变化,带来了贵族阶层的消亡。科举制在隋唐时被确立,一直到清代晚期西方文明进来之后才被废除。在科举制度下,我认为很少有纯粹的文人。如果要讲纯文人的话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以下是士人与文人的合流。在科举制下,人们通过对知识的学习,然后参加科举考试,最后到庙堂之上实现自己的抱负。朝廷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唯一可以实现自己价值的地方。所以不管受过多少的挫折,他们对朝廷的想望、依赖是很难淡化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人为例,譬如苏东坡。从他的作品和生活方式来看,苏东坡应该说是一个文人,一个典型的文人。我曾经有个学生就非常迷恋苏东坡,把苏东坡作为自己的偶像。但是,苏东坡还有另外一面,

那就是：无论朝廷对他多么残酷，甚至用文字狱的方式把他一贬再贬，最后把他贬到海南岛去了，都没有淡化他的功名之心，一旦朝廷对他的态度稍稍有一点变化，他就高兴得不得了。这是文人和士人合流之后产生的一种现象。所以苏东坡和魏晋那些人比较，你可以看到，他身上文人的东西不纯。他是文人和士人合流之后的一个典型代表。

但是，中国文人在与士人合流之后还是有一些比较纯粹的代表，具体说来有这样两个群体。

一个是在元代。我们知道，元代由蒙古族统治，它推行的是一种民族歧视的政策。统治阶级把人分为四类，其中，南人是最低等的，是不能去当大官的。这样就断绝了士人向朝廷发展的一条路。所以有知识的人，像关汉卿他们，最后没有办法，就干脆混迹于风月场上，出入于烟花柳巷，最后在那里写诗、填词、绘画、作曲，以此来抒发自己心中的苦闷和情感。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在那种社会环境下他们不得不这样。所以，这样的文人难以像魏晋人那样去“为艺术而艺术”，文的创作，乃至文人的生活方式，在他们那里成了一种游戏人生的途径。

还有一个是明代中叶之后出现的一群人。现在学术界的一个观点是，资本主义萌芽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这是大陆学界的一种观点。这个我们不去讨论。我们现在要谈的是，明代中叶之后，社会确实发生了变化，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江南经济，特别是手工业的发展。这个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阶层的出现，就是市民阶层。市民阶层出现之后，他们的需求就为一部分有文化的人摆脱对朝廷的依赖、对官场的依赖提供了条件。我们看明代中叶之后江南的一群文人，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唐寅、仇英、祝枝山、文徵明那一群人，乃至一直到清代的“扬州八怪”，这些人不必像苏东坡那样，非要把朝廷作为自己唯一的依赖。他们把自己的艺术变成商品，使其进入流通流域，换取自己生活的需要，然后通过这些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从而实现自我生存的价值。于是，这些人就淡泊了功名之心，用艺术转换成商品之后换取的财富来按照自己理想的生存方式去生活。我觉得在士人与文人合流之后，到明代中叶之后才真正出现了一批比较纯的文人。士人的东西在他们身上已经非常淡了，文人的特征则非常明显。

明代中叶之后一直到清代前期那一群人，应该说他们也是比较纯的文人，但是，如果将这一时期的文人和魏晋时期的文人相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二者之间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魏晋文人的身上具有一种贵族的气质，他们是一群极具个人魅力的人，而在明中叶到清初的文人身上，则多了一些市民的俗气和痞气。

这一讲将文人的发展简单地拉了一条线，主要是想整体把握一下中国文人的发展状况，具体内容将会在今后的课堂中仔细地讲解。

今天的授课内容至此结束，最后推荐一批阅读书目。

陈 寿 《三国志》

房玄龄 《晋书》

刘义庆 《世说新语》

严可均 《全后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

萧 统 《文选》

王仲荦 《魏晋南北朝史》

刘师培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鲁 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宗白华 《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

王 瑶 《中古文学史论》

罗宗强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马良怀 《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之研究》